

序 论

韩国独立运动评价与 朝鲜半岛统一

历史研究历来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笔者 10 多年来从事在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深感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在对待近代朝鲜半岛历史的这一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情绪对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朝韩双方关系的真实面貌及实现朝鲜半岛统一的艰难性与长期性。

—

日本灭亡韩国后，韩国侨民在中国进行的韩国独立反日斗争，其地域之广、人数之众、党派之多、时间之长、斗争之烈，较之世界其他地区，如美国、苏联远东地区、日本等地的韩国侨民独立运动是最为突出的，为韩国的独立光复作出的历史贡献也最大。在中国的韩国移民各阶级、各党派都参加了韩国独立复国斗争。就其政治影响和历史作用而言，最主要的有三股互不相辖的政治势力：其一是在中国东北日本沦陷区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中活动的以金日成、崔庸健等为代表的朝鲜抗日革命力量；其二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领导的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八路军、新四军并肩战斗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其三

是长期在中国关内地区活动的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心和领导下的各派抗日力量。前两者共同参与创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三部分力量有所分化，少数人加入北方政府，多数人成为创建大韩民国政府的主要参与者和组织者。尽管这些党派和政治势力的政治信仰不同、活动地域不同、参与斗争的方式也不相同，但他们都为韩国独立光复英勇奋斗，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奋斗正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建国的基础。^[1]

然而，由于受冷战时代和朝鲜战争的影响以及双方现实政治的对立与矛盾，影响到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的研究和评价。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南北双方的学者基本上都只研究有利于本方的党派的韩国独立运动史，或是不提，或是批评，甚至攻击对立党派的独立运动奋斗历史。

首先是名称问题。北方坚持称“朝鲜独立运动”，南方则坚持称“韩国独立运动”，而在近代历史上，“朝鲜”与“韩国”两种称呼是混同使用的，无论是民族主义派的政治家、学者，或是共产主义派的政治家、学者，都在各种场合随意混同使用。翻阅朝鲜共产主义者早期的历史文件，我们随处都可以见到“韩共”、“韩人”、“韩侨”等提法；同样，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的讲话、文章以及各种文件中也不时可以见到“朝鲜”的提法，甚至有些参加临时政府的政党是以“朝鲜革命党”命名的。^[2]实际上，“朝鲜”和“韩国”的英文都是“KOREA”。因此，名称之争完全由于现实政治斗争而起，在学理上毫无意义。

其次是关于“三一”运动的研究。对于同一历史事实作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关于“三一”运动的起因——北方称“三一”运动外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内受国民会的影响，而国民会是金日成的父亲领导的，南方则强调“三一”运动的起因主要是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宣言”和天道教、基督教等教会的影响和作用；关于运动的领导力量——北方强调青年学生是运动的主体，

南方则认为运动的主力是教会的教徒；关于运动爆发的地点——北方提出首先从平壤开始，以后是汉城并发展到全国，南方则坚持认为运动首先从当时的京城汉城开始，迅速席卷全国。^[3]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出现分歧是很正常的，但上述诸种分歧明显带有很强的政治因素，使历史评价与政治宣传相混同。

第三是关于韩国临时政府的评价。对于在“三一”运动高潮中建立并在中国坚持了 27 年之久的韩国临时政府，双方的评价更是南辕北辙。北方的《朝鲜通史》指责韩国临时政府是对朝鲜民族独立运动“袖手旁观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在海外组成的“亡命团体”，“他们在搞民族主义运动的幌子下，进行事大主义的卖国卖族活动”；“临时政府的要人们把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旗帜当作一块破烂货扔在一边”，忙于“相互进行斗争”；临时政府外交活动是“向大国搞请愿活动的求乞行为”；临时政府中的大卖国奴们“从爱国同胞那里刮去很多财物，并把它们揣入私囊”“挥霍殆尽”等等。^[4]南方的学者却走另一极端，他们中有些学者对于临时政府作了不适当的过高的评价，认为临时政府“对外是韩民族的惟一代表机构，对内成为指导统辖独立运动的最高机构”，甚至认为今天的大韩民国政府渊源于临时政府，1987 年制定的《第六共和国宪法》认定韩国临时政府是大韩民国法统的主体，据此，有的韩国学者提出要将 4 月 11 日（韩国颁布《临时宪章》日）定为制宪日，将 4 月 13 日（韩国临时政府成立日）定为全国纪念日，以韩国临时政府建立的年号为大韩民国的年号等；他们反复论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法统性，强调今天的大韩民国与历史上的韩国临时政府间的历史继承性，从而进一步论证其政府的合法性。^[5]另一方面，又全盘否定金日成派的抗日活动，目前韩国法律严禁宣传共产主义派的抗日活动，目的也在于否定另一政府的合法性。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旧址自 1992 年开放以来，已有包括三任韩国总统卢泰愚、金泳

三、金大中在内的 75 万韩国人前去参观，但迄今没有一个朝鲜方面的人士光临该地。

综上所述，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尤其是对领导韩国独立运动的各抗日党派的评价，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以政治需要歪曲历史的真实面貌；二是双方情绪对立，不能平静研讨问题；三是制定制约对方的法律，使正常的研究成为不可能。这不仅会影响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的顺利进行，也必定会影响朝鲜半岛统一的历史进程。

—

随着刀光剑影的冷战时代的结束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关系的趋向缓和，韩国独立运动史的研究和评价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笔者要特别提及的是原韩国国家报勋处官员、现韩国高句丽出版社社长李辅温先生。早在 1995 年，他就和笔者商议研究韩国共产主义派所进行的独立运动史问题，极力主张应改变韩国学术界对于这方面研究的空缺。1996 年，笔者先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关系纪事》和《金若山将军传》两书，并交由李先生在韩国出版。此两书的内容在当时的韩国都属于违禁范围。为此，我曾经征询过韩国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学术活动家的意见，他也认为这一类书还是在中国出版比较妥当，在韩国违反反共产主义宣传法，如在韩国出版，万一政府依法追究将会很麻烦。然而，李先生还是毅然将这两本书分别在 1997 年的夏天和冬天如期在韩国出版了，实际上好像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和麻烦，同时高句丽出版社还出版了由李先生和杨昭全先生合作撰写的《朝鲜义勇队战史》。在他的奔走和努力下，2002 年 10 月，在金秋的中国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举行“朝鲜义勇军抗日战史国际研讨会”。笔者不能不钦佩李先生的勇气和为学术献身的精

神。同时，也使人们感觉到随着韩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韩国独立运动研究的某些禁区已被打破。2002年9月，韩国著名学者、韩国光复军老战士、前高丽大学校长金俊烨教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申圭植与中韩关系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将金日成与韩国独立运动中的李东宁、李承晚、申圭植、金九等相提并论，并提出“对于他们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6]这是笔者所看到的韩国学者首次对金日成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上的地位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于韩国独立运动中的左右合作运动的研究也逐步有所发展。在中国关内地区以韩国临时政府为中心的独立运动中，也同样存在着持有各种思想倾向的政治党派，如被视为右翼民族主义党派的韩国独立党，被视为左翼共产主义党派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在韩国独立运动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两党曾联合其他一些党派多次进行过左右合作运动，以适应反日复国运动的需要。随着韩国民主化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以及朝鲜半岛局势趋向缓和，韩国学术界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左右合作运动的研究从70年代开始起步，80年代走向正规，90年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发表论文共计23篇，单行本2卷。^[7]

1999年11月，韩国安东大学金喜坤教授在韩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韩国临时政府左右合作运动的研究及其成果》一文，对于该项研究作了回顾和总结。他指出：在韩国临时政府存在期间曾经发生过6次左右派合作运动：（1）1919年3月和4月韩国临时统一政府的达成；（2）1923年国民代表会议的举行；（3）1926—1927年的韩民族惟一党运动；（4）1932年韩国对日战线统一同盟的建立和1935年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成立；（5）1939年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在綦江举行七党、五党合作会议；（6）1942—1944年韩国临时政府与左翼朝鲜民族革命党达成统一。金喜坤教授总结说：“近

年来，对以临时政府为中心的左右合作（统一战线）运动的研究发展迅速。原因在于民主化运动有了较大发展，朝鲜半岛南北统一的可能性比任何时期都显得有了眉目，热切期望能创造出民族自主和平统一，这样从一开始集中研究国民代表会议或惟一党运动，转到研究与临时政府相关的诸政党左右合作（统一战线）上来，对左派的研究也相继活跃起来，如对朝鲜民族革命党和以她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阵线与临时政府的合流，对临时政府与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关系的研究等。”^[8]明确指出该项研究的开展与朝鲜半岛的南北统一事业直接有关，这应该说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开端。

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也可以见到一些新的动向。1999年6月26日，是韩国临时政府后期的主要领导人金九先生逝世50周年。24日，汉城隆重举行《白凡金九全集》出版首发式，金大中总统亲自到会致辞，高度评价金九先生的历史功绩，称颂金九虽死犹生，是英雄，是伟人，是导师，他的精神将永垂青史。随后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据平壤广播报道：6月26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在牡丹峰剧场以民族和解协会的名义举行“追念白凡金九先生大会”，称颂金九先生是“早年就热爱祖国和民族，追求民主自主独立的、有良心的民族主义人士”。这是朝鲜方面50年来首次隆重举行纪念金九先生的活动，其意义十分重大。^[9]

三

笔者认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评价，与中国海峡两岸对于抗日战争研究所经历的过程，颇有些类同。数十年来，两岸的中国学者在敌对情绪十分激烈的大背景下，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在观点上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大陆学者坚持抗

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批判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台湾学者则强调抗日战争是国民党领导的，攻击共产党“游而不击”，在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战略方针问题、两个战场问题、敌后根据地问题以及两党关系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观点都是尖锐对立的。然而，差不多经过 10 多年的交流，两岸学者在两岸各地举行过无数次的研讨会，双方虽然依然存在着种种分歧，但在认识上距离大大缩短，已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研讨的气氛。笔者以为，这不仅对于公正科学地进行史学研究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两岸民间的交流和两岸关系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两岸学术交流的做法，或许可为韩朝双方提供某种借鉴作用。

笔者以为，朝鲜半岛南北学术界对于朝鲜半岛独立复国运动的评价，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在实现南北统一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大历史认识问题。如果韩国学者坚持认为“大韩民国”是继承了当年韩国临时政府的“法统”，并以此来证明和强化其政府的“正统”地位，暗示或指责对方的“无法统”、“非正统”，那么，双方怎么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解呢？反之，朝鲜学者对于在中国国民政府统治区坚持和领导抗日复国运动长达 27 年之久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也一样是不利于朝鲜半岛的统一大业的。

朝鲜半岛南北学术界有责任，也有可能为民族的统一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此笔者建议，对于朝鲜半岛独立复国运动的研究应注意下列诸端：

- (1) 建议政府废除相关的禁律，允许学者自由研究和讨论；
- (2) 承认和公正评价韩国各抗日党派在独立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 (3) 加强双方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
- (4) 在南北两地举行各种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充分收集、整

理、交流各抗日党派的抗日活动史料，推进研究工作的深入；

(5) 修订双方的历史教科书，以正确、公正的历史事实教育青年一代，奠定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最重要的人文基础。

四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由于朝鲜独立运动的相当部分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与中国各党派有着密切的关系，亦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加强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和有关资料的整理，在学术观点上应尽力避免陷入或迁就任何一方的派性观点，并努力促进南北双方学术观点的交流。这项工作无疑将会对推动朝鲜半岛的统一和联合起到积极的作用。

10 多年来，笔者本着上述精神，力图以科学和公正的态度，对韩国独立运动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注意研究韩国独立运动各个党派的活动。1995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著的《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该书在内容上以韩国独立党和韩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关系为中心，旁及其他相关的内容。1997 年，我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研究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着重反映韩国独立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派，1997 年由韩国高句丽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韩文简本，2000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全本。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论文专集《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论题兼及韩国独立运动各个党派及其代表性人物，党派包括在东北坚持抗日活动的韩籍革命者、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韩国临时政府以及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活动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等。人物包括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安重根、安昌浩、金九、尹奉吉、金若山、金山、武亭、金白渊、朴孝三、朴一禹等。1995、1999、

2002 年我参与主持了 3 次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国际学术会议。^[10]在这 3 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各个党派的抗日活动及其历史作用展开了论述和争论，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新进展，其研究成果已收入会议论文集《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二十七年血与火的战斗——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80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和《申圭植、闵弼镐与韩中关系》。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要全面地、公正地评价参加和领导韩国独立运动的各个党派和社团。

在此期间，我还指导我的学生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各个党派和社团进行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分别是：石建国著《抗日战争时期的韩国独立党研究》、王蓉著《抗日战争时期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研究——以 朝鲜义勇队通讯 为中心》、郑龙发著《抗日战争时期的朝鲜独立同盟研究》、周春雨著《中韩文化协会研究》、[韩]曹恩惠著《国共两党新闻媒体对于韩国独立运动报道的比较研究——以 新华日报 与 中央日报 为中心》。他们分别以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韩国独立运动党派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独立同盟以及最为重要、规模最大的社团——中韩文化协会为研究对象，深入细致地收集史料，特别是收集和整理若干尚未被注意的档案史料，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推进了韩国独立运动研究的深入。如石建国曾赴南京、綦江和重庆进行调研，收集和使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綦江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的许多档案史料，这是很可贵的。王蓉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对《朝鲜义勇队通讯》进行细致的梳理，以新的视角对于朝鲜民族革命党进行了研究。国内有关朝鲜独立同盟的档案尚未开放，郑龙发在研究中综合运用了文献资料、报刊资料以及访问资料等，在国内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朝鲜独立同盟活动的全过程，并给予适当的评价。周春雨对于中韩文化协会的研究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和开拓性的贡献。韩国留学生

曹恩惠则以国共两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为研究对象，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根据国共两党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不同态度进行很有特色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的研究。另外，笔者的论文《中国国民党援助韩国独立运动与越南独立运动比较研究》和《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的历史记录》论及的问题与本书的主题有关，也一并收入本书。希望这一编排能有助于读者理解笔者通过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活动的公正客观研究和评价，促进朝鲜半岛南北统一的主旨。收入本书的主要是石建国等的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在答辩时曾得到好评，他们也都以优良的成绩获得复旦大学硕士学位。此次结集出版，我又一次对这些论文进行了校读，重新编组，并作了一些修改和润色。但是，疏漏和错误之处，仍在所难免，敬请学者专家多多批评指正。

最后，我要对本书涉及的各个专题先后给予帮助的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研究项目）、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奖学金项目和出版资助）以及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三年行动计划自筹重点项目）表示深深的谢意！

石源华

2002年11月定稿

注释

[1] 参见拙作：《韩国临时政府的历史评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参见拙著：《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拙著：《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参考杨昭全：韩国近现代史系列讲座（1996年11月复旦大学）。

[4] 参见〔韩〕金昌洙：《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历史地位》，转引自

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5] 参见[韩]赵恒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政治主张及其正统性》，转引自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韩]李炫熙：《韩国临时政府的法统性研究》，复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第 7 辑。

[6] 金俊烨：《纪念申圭植先烈的意义》，《申圭植与中韩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2 年 9 月。

[7] 据韩国安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喜坤统计：（1）70 年代论文 2 篇。秋宪树：《对韩国临时政府下的左右合作运动研究》，国土统一院，1974 年。李炫熙：《召开国民代表会议问题》，《白山学报》18，1975 年。（2）80 年代论文 7 篇。朴永锡：《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国民代表会议》，《韩国史论》国史编纂委员会，1981 年。金喜坤：《对韩国惟一独立党促成会的考察》，《韩国学报》33，1983 年。安俊燮：《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下的后期左右合作》，《韩国社会史研究会论文集》1，1986 年。郑学燮：《日帝时海外民族运动的左右合作与三均主义》，同上。朴永锡：《民族惟一党运动》，《朴性凤教授花甲纪念史学论丛》，1987 年。裴京汉：《黄埔军校中国共间的合作与对立》，《对中国国民革命的分析研究》，知识产业社，1988 年。安俊燮：《韩国临时政府下的左右合作运动》，《统一战线与民主革命》2，1988 年。（3）90 年代论文 14 篇、单行本 2 卷：朴永锡：《国民代表会议》，《韩民族独立运动史》7，1990 年。韩相福：《韩国对日战线统一同盟与民族协同战线运动》，《尹炳奭教授花甲纪念韩国近代史论丛》，1990 年。姜万吉：《韩国民族革命党与统一战线》，和平社，1991 年。廉仁镐：《解放前后民族革命党的民族统一运动》，《历史研究》1，1992 年。李炫熙：《上海时代的临时政府与民族统一战线运动》，《韩国近代史论争焦点》4，1994 年。韩诗俊：《重庆时代临时政府与统一战线运动》，同上。金荣范：《对 1920 年代后半期民族惟一党运动的再考察：以在中国关内地区的经过与归趋为中心》，《韩国近代史研究》1，1994 年。姜万吉：《1930 年代中国关内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战线论》，《韩国史研究》90，1995 年。金喜坤、韩相福、韩诗俊、俞炳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左右合作运动》，韩屋儿（音译），1995 年。赵澈行：《国民代表会（1921—1923）》，《史丛》44，1995 年。韩相福：《中日战争后协同战线运动与全国联合阵线协会》，《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10，

1996 年。张锡兴：《朝鲜共产党临时上海部的统一战线与六·一〇运动》，《于松赵东杰先生退休纪念论丛》 2，《韩民族运动史研究》，1997 年。朴润载：《1920 年代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与国民代表会议》，《学林》 17，1997 年。李万烈：《临时政府的统合运动》，《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 12，1998 年。韩相福：《日帝时中国地区的协同运动及其意义》，《岛山思想研究》 5，1998 年。金喜坤：《安昌浩在中国关内地区的统一运动》，同上。

[8] 该文的中文译文已收入复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第 7 辑。

[9] 宣德五：《韩国隆重纪念白凡金九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当代韩国》夏季号，1999 年。

[10] 这 3 次国际会议均由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办，它们是：
(1) 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国际学术会议（1995 年 4 月）；(2) 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80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1999 年 4 月）；(3) 申圭植与中韩关系国际学术会议（2002 年 9 月）。

第 一 编

韩国独立党研究

序 言

韩国独立党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背景下，由韩国在华坚持反日复国斗争的爱国党派韩国国民党、（旧）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三党合并而组成的新政党。尽管它与历史上的旧韩国独立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事实上并不是旧韩国独立党的简单延续。抗日战争期间，韩国独立党曾是韩国临时政府的执政党，后来虽然其他党派也被吸收参加了韩国临时政府，但至中国抗战结束，韩国独立党一直在韩国临时政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占有垄断的地位。韩国独立党积极领导旅华侨民的反日复国斗争，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为韩国独立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在近代中韩关系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对韩国独立党进行研究十分必要和重要。

然而，对于抗战时期在华活动的韩国独立党，中国国内很少有人专门进行研究。在韩国，有李炫熙的《韩国独立党之独立运动与白凡》（《白凡研究》，1987年第3期）、赵凡来的《韩国独立党研究（1929—1945）》（《韩国民族运动史研究》，1987年第2期）、卢景彩的《韩国独立党研究》（高丽大学校大学院史学科博士论文，1992年）等，对韩国独立党进行了研究，给笔者以很多启示，但他们的研究尚没有注意到引用中文资料，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且从总体上来说，对韩国独立党的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充分利用中国所保存的原始档案资料的

基础上，根据韩国独立党在抗战时期的主要活动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按照历史发展的过程，分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韩国独立党的创立、韩国独立党与韩国临时政府、韩国独立党与中国国民政府、关于韩国独立党的历史分析 4 章进行论述，以期对该党历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笔者在研究中掌握和使用的主要资料有：杨昭全主编《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台北国史馆《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韩国国家报勋处《海外的韩国独立运动史料》、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等，除此之外，笔者还前往南京、綦江、重庆、上海等地档案馆发掘原始档案资料，收获丰富，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补充了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空白。

第一章

中国的抗日战争和韩国 独立党的创立

一 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

韩国是中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邻邦。自 19 世纪末以来，韩国相继遭到了列强的侵略，尤其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成为侵略韩国的急先锋。当时亚洲的政治均势也有利于日本的侵略活动。作为朝鲜^[1]宗主国的中国，由于清王朝自身腐败不堪，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任意宰割的羔羊。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其势力完全被逐出了朝鲜。马关之耻既是中国以后发愤图强的缘由，也是中国人民日后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原因。1904—1905 年，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排除了殖民朝鲜的外部干扰因素。1910 年 8 月，日本强迫朝鲜李氏王朝签订《日韩合邦条约》，正式吞并了朝鲜。

然而，朝鲜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爱好自由和独立，富于反抗精神的朝鲜人民不会心甘情愿地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自 1875 年的“云扬号事件”起，日本对朝鲜的一系列侵略行为，已经激起了朝鲜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2]特别是日本吞并朝鲜之后，朝鲜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一天也没有停止